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历史根源与当代演进

负责人：刘宗义

作者：刘宗义 吴孟克 谈晨逸 张笑吟 龙凤穆



总第61期
2026年7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创新工程
项目成果

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历史根源与当代演进

负责人：刘宗义

作者：刘宗义 吴孟克 谈晨逸 张笑吟 龙凤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南亚研究中心

2026年7月

作者简介



刘宗义
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吴孟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谈晨逸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笑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龙风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目 录

前言：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由来	01
第一章 关于中印边界争议	03
（一）史料参考的双重标准	04
（二）蚕食“无争议”论	07
（三）非法历史文件“有效”论	09
（四）“中国背叛”论	10
（五）印度“胜利”论	11
（六）小结	11
第二章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13
（一）美国“恩赐”论	14
（二）中国经济“崩溃”论以及印度“替代”论	16
（三）“债务陷阱论”与“珍珠链论”	18
（四）小结	21
第三章 关于跨境水资源	22
（一）印度涉华水资源叙事的阶段性演进	23
（二）主要手段与潜在逻辑	25

(三) 涉华水资源叙事的现实目的与政策影响	26
(四) 小结	28
第四章 关于涉藏问题	29
(一) 谬称西藏为“独立国家”	30
(二) 推动将涉藏问题国际化	33
(三) 小结	36
第五章 关于中国“神山圣湖”	37
(一) 当代印度人对我国“神山圣湖”的称呼	38
(二) 印度香客赴藏朝圣主要是帝国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	39
(三) 印方企图利用香客朝圣在我国“神山圣湖”确立“文化主权”	40
(四) 小结	42
结论：歪曲对华认知不符合印度自身地位与利益	43

前言：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由来

2020年12月，欧洲独立智库“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发布一份名为《印度纪事》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从2005年以来，印度情报机构为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事实，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实际上，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只是2005—2020年间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一部分事实，印度出于政治与外交，系统开展涉华舆论宣传战与虚假叙事，其涉及范围要比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更长更广。

所谓舆论宣传战，是指在政治、军事、商业或意识形态竞争背景下，行为体通过系统化、策略性地运用大众传播与信息操纵手段，故意构造并散布偏离客观事实的叙述框架，以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情感判断与行为取向，从而实现特定战略利益或削弱对手合法性的活动。其常见手段是抢占“第一解释权”，通过集中报道某一事件引导议程，运用定向宣传手法强化对某一国家、组织或个人的刻板印象，而现在更多的则是利用利用社交网络，借助算法和“信息茧房”效应加速特定观点的扩散与放大。虚假叙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捷径或核心战术手段。虚假叙事特指那些虽呈现为连贯情节、因果解释或道德评判，但其核心事实、逻辑前提或隐性预设与可验证现实存在系统性偏差的信息结构。虚假叙事作为舆论宣传战的一种手段，屡见于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之中，尤其值得辨别与警惕。

舆论宣传战的根本目的是在认知空间争夺影响力，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巩固己方阵营。而人的认知并非纯理性，而是充满各种系统性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认知偏差。宣传战本质上是对这些心理漏洞的“精准攻击”。发动宣传战的决策层和核心策划者，在策略层面通常不会有认知偏差。但无意识认知偏差是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摆脱的心理底层操作系统，宣传战发动者也不例外。他们可能在精密计算如何触发别人的“确认偏误”时，自己正深陷于某种更高级的“元偏差”而不自知。在动机层面，他们往往被某种“元认知偏差”驱动，并主动利用和制造偏差。而中层执行者和狂热信徒，则可能完全被偏差吞噬。印度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发动者也是处于类似心理状态。

印度发动对华舆论信息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印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论战中，印度人利用其英语优势混淆视听，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印边界是根据地理上的所谓“分水岭原则”和“合法的”国际条约划定的。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为掩盖尼赫鲁政府对华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的错误，又编造所谓“中国背信弃义”、在印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袭、侵略印度领土等言论欺骗其国内民众，并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几十年来，印度教育和宣传部门一直使用这一宣传口径，使得所谓中国“侵略”印度的说法成为印度人的“常识”。最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印边界摩擦增多，印度方面加大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印关系的负面宣传力度。

印度方面涉华舆论信息战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参与模式，参与者不仅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还包括了政党、社会团体、智库、媒体，乃至学者和个人。由于印度人大量移民海外，进入 21 世纪之后，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美、英、加、澳等西方国家的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关于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颠倒黑白的说辞已经被颠倒黑白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这些说法迎合了国际反华势力的主张，因此也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认同。另外，由于印度曾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之一，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大影响力，印度方面的这些说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市场。2020 年 6 月 15 日，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国际社会英文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认为是中方蓄意挑起冲突，发动对印军的突袭，而印度是加勒万流血冲突的受害者。

进入 21 世纪之后，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已从边界问题等双边领域扩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边领域。所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是“债务陷阱”，给

南亚印度洋国家造成“债务危机”等谣言，最早也是发源于印度，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等人编造的。此人也是所谓中国要利用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作为武器威胁南亚下游国家等谣言的积极鼓吹者。印度对“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抹黑和负面宣传，对南亚国家民众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误导，同时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和抵制“一带一路”提供了口实和抓手。

印度方面发起涉华舆论宣传战出于多方面目的：在边界谈判和斗争中争取优势；赢得国内政治支持；在国际社会破坏中国形象，提高印度国际地位；为将来的侵略扩张、建立“大婆罗多”制造舆论，等等。

当前，中印关系似乎正在回暖，印度政府对其对华战略进行了一些微调，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以获得中国技术。如果印方真的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那么就必须放弃针对中国的舆论宣传战。但比较遗憾的是，印度政府及其喉舌好像并未放弃针对中国开展舆论宣传战。近期，前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及其前同事沙米特拉·查特吉（Shamitra Chatterjee）在美国媒体和军方的大力支持和襄助下，推出了所谓“中国挤压论”（china squeeze）及“中国抽梯论”（pull up the ladder）。所谓“中国挤压”，就是污蔑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方面带来了“冲击”（china shock），而且“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方面的发展空间，同时抽走全球南方国家往上发展的梯子。显然，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美印西方的新叙事。

从“债务陷阱”到“中国挤压”，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印度战略界和政策界某些精英那种特殊的“羡慕嫉妒恨”的“仇华”心态，以及积极配合美西方打压中国的“同仇敌忾”心理。这些事实的存在要求我们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对印度涉华舆论战和编造涉华虚假叙事的行为进行归纳总结、揭露批判，深挖其根源、意图，向国际社会揭露印度这一行为背后的本质与表现，以正视听。

第一章

关于中印边界争议

中国和印度边界超过 2000 公里，划界问题是两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印度最容易操弄对华舆论的敏感议题。长期以来，印方围绕中印边境划分和走向长期进行涉华舆论宣传战、构建了系统化虚假叙事，通过选择性使用殖民时期地图、篡改官方地图标注、拔高真实性存疑的历史文件，以及歪曲历次边境冲突起因等方式，逐步将其领土扩张主张包装为“历史事实”和“国际共识”，为服务自身领土野心和对外策略提供话语支撑。整体看，印涉边境舆论宣传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类：一是史料考察上的“双重标准”，即对英殖民时期历史地图和档案“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二是以长期非法蚕食行动自我宣称划定了“无争议边界”；三是拔高乃至捏造“历史文件”“行政记录”的效力，虚构所谓“历史主权”；四是将历次边境冲突简单归因于“中国背叛”“中国先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印度胜利”“中国受挫”等对内动员叙事

（一）史料参考的双重标准

印度政府在涉及中印边境划界问题上，对英殖民时期地图和相关文件采取高度功利化的选择性解读：凡是有利于其扩张诉求的地图与档案，即被视作“国际公认边界依据”；凡不利于印主张的材料，则被有意忽略甚至否定。以中印边境东段为例，印方恶意夸大“麦克马洪线”（以下简称“麦线”）的效力，并通过重新论

释“内线”¹掩盖自身缺乏实际管辖的历史事实。尼赫鲁政府基本继承了英殖民当局在“西姆拉会议”期间炮制“麦线”的立场，将其视为既定边界。尽管“麦线”以粗略、未经充分考证的方式，擅自将传统习惯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中国西藏领土划给英属印度，尼赫鲁仍在1950年公开宣称：“不管有地图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在地图操作上，印度政府在1954年官方地图中将“麦线”直接描绘为“已定边界”，抹去1935年公开地图上长期存在的“未经定界”标注。随后，其又在1955年提出用“东北边界”替代“麦线”提法，²通过改变话语符号淡化该线非法来源。与此相对应，印方一方面辩称“内线”只是“内部行政划分线”，³另一方面又利用“内线”恰好大致对应中印东段传统习惯线的事实，将英印殖民时期“科学边疆”战略下形成的“边境部落区”（Tribal Areas）包装为自身历史上早已行使管辖的地理区域。实际上，历届英印政府受制于行政能力和军事实力有限性，从未在“内线”与“外线”（近似“麦线”）之间的区域实行真实有效的行政管理，该安排本身只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临时性殖民构想。1950年版印度官方地图亦清楚显示（参见图1），印方并未对东段“边境部落区”实施管辖，直至1954年版地图才捏造出所谓“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⁴并将该区划入阿萨姆邦行政体系管辖（参见图2）。整体看，尼赫鲁政府及其后的历届政府在“麦线”“内线”问题上的反复操作，暴露出印方在史料采用上的根本性“双标”。一方面，印度刻意淡化殖民协议的非法性和自身缺乏实际控制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借助地图命名、行政划设等手段，为事后扩张寻找“历史依据”，通过不断叠加的图幅和话语操作，逐渐将原本存疑的殖民遗产硬性塑造

1 所谓“内线”（Inner Line），是指英属印度当局为强化对印度东北地区边疆的控制，于1873年通过《孟加拉东部边境条例》人为划定的一道行政边界。该线将印东北低海拔河谷地带与高海拔丘陵、山地地区分隔开来，规定外界人员进入线内丘陵山地须事先获得英印政府的行政许可，旨在限制外来影响、维护部落地区的既有秩序。从治理形态上看，“内线”实质上勾勒出英印当局在东北边疆能够实施有效行政管控的地理极限，线内区域实行相对严密的直接管理，线外则仅维持松散的控制，且未划定明确的外部政治边界。这一制度奠定了此后印度东北部“内线”与“外线”二元治理结构的基础，其遗产以“内线许可证”等形式延续至今。

2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59页。

3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境问题的报告》，北京，外交部出版，1961年版，第136页。

4 姚远梅：《姚远梅：针对中印边界问题东段，印度用了哪些虚假叙事手法？》，观察者网，2025年9月23日，https://m.guancha.cn/YaoYuanMei/2025_09_23_791063.shtml。

成“天然边界”。



图 1: 印度测量局 1950 年版印度地图, 将中印边境东段标记为“未定边界”, 且图中无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来源: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States. *White Paper on Indian States*, New Delhi: The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50.)



图 2: 印度测量局 1954 年版印度地图, 将原来的“未定边界”篡改为“已定边界”, 并无端增加了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来源: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Survey of India. *Political Map of India*. 2nd ed. [Dehra Dun, India]: Survey of India, 1954. 1 map : col. ; 76 x 83 cm.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MAP G7651.F7 1954, <https://nla.gov.au/nla.obj-234365954/view>。)

（二）蚕食“无争议”论

所谓蚕食“无争议”论，指印度企图以印军自 1920 年代以来持续推进的非法占领为依据，将原本存在争议的区域包装为“天然属于印度、不存在分歧”。其做法主要体现为两条路径：一是依托军事行动前推单边划定控制范围，逐步形成驻军、巡逻和道路建设等事实控制；二是随控制范围扩大同步修改官方地图标注，试图将非法控制转化为“既定边界”。以中印边境中段为例，桑、葱莎、波林及巨哇、曲惹等区域长期未划定边界，英印殖民时期至 1940 年前后发布的多版印度测量局地图均未标注边界线（参见图 3、图 4、图 5），1940—1950 年间虽采用颜色区分接壤区域，但仍明确标注“边界未经规定”。⁵ 然而，1954 年印度官方地图将上述地区直接纳入印版图，并将此前未定的边界线固定为“既定边界”。⁶ 这一变化并非来源于历史依据，而是随印军在上述地区的逐步控制而同步推进。



图 3：印度测量局 1903 年版印度地图，中段未将桑、葱莎、波林及巨哇、曲惹等地区划入英属印度，东段仅大致沿传统习惯线作不完全标注。（来源：Past of India, <https://www.past-india.com/photos-items/british-indian-empire-1903-vintage-map/#iLightbox/gallery26932/0>）

5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境问题的报告》，北京，外交部出版，1961 年版，第 131 页。

6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 年版，第 59 页。



图 4: 印度测量局 1915 年版印度地图, 完全未注明中段中印边境, 东段仅沿传统习惯线作不完全标注。(来源: 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线上图书馆, <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agdm/id/27992/rec/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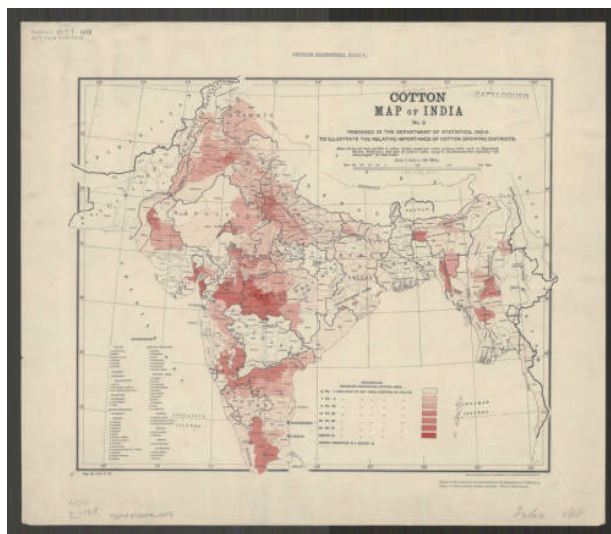


图 5: 印度测量局 1918 年版印度煤炭分布图, 完全未注明中段中印边境, 东段仅沿传统习惯线作不完全标注。(来源: 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线上图书馆, <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agdm/id/16703/rec/2516>)

进入 21 世纪后, 印方进一步将非法单边控制包装为“无争议领土”, 以此长

期拒绝中方提出的在东段、中段建立两军常态化磋商机制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通过中央与地方政治人物频繁赴实控线地区站台、推动争议地区边贸口岸建设等方式，强化行政存在，试图单边将实控线宣称为政治边界。总体看，该类型叙事本质上是以占领替代谈判，以控制替代治理，以既成事实替代历史证据，将边境问题既定化、固化，削弱两国谈判空间。

（三）非法历史文件“有效”论

非法历史文件“有效”论主要体现为印方试图依托真实性存疑的殖民时期资料，建构所谓“行政连续性”，进而单边宣称“历史主权”。以中印边境西段为例，在1961年边境磋商中，印方提出两类所谓“历史依据”：一是零散行政记录，如磑木绰克村纳税记录、1914年印英政府公布的《查谟克什米尔狩猎法案》等文件。此类资料问题突出，既缺乏行政体系连续性，也存在明显矛盾，例如磑木绰克村1901年纳税记录两份版本金额不一致，不能构成行政权行使证据。二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印英政府在争议地区开展的测绘活动记录。上述测绘本身带有明显政治目的，属于殖民时期服务于英俄争霸的非法勘探，并曾延伸至中国甘肃境内。印方试图将此类测绘行为等同于治理行为，逻辑上站不住脚。⁷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印方在1954年地图中将原本未正式划定且长期由中方实际控制的阿克赛钦、班公湖、磑木绰克 / 典角地区纳入印度版图，⁸并以此反向证明所谓“历史治理”。印方反复挖掘殖民遗留材料，其核心目的是寻找形式上可引用的“文件证据”，为突破历史习惯线、单边宣称领土主张提供话语依据。

7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境问题的报告》，北京，外交部出版，1961年版，第108-116页。

8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62-63页。

（四）“中国背叛”论

“中国背叛”论是印度在涉华边境叙事中使用频率最高、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类虚假叙事，其核心逻辑是将历次边境摩擦的责任完全归因于中国，并将中方正常防卫行动污蔑为“违约”“突然袭击”。在历史叙事维度中，印方将1962年边境冲突塑造为“中国违背1950年代友好承诺的结果”，并借此强化所谓“印度被欺骗”的情绪认知。在印度学界和政策体系中，该叙事长期顽固存在。相关研究普遍基于三个前提假设：一是印度对争议地区主张“天然合法”；二是中国的军事行动属于“突然侵略”；三是印度失败源于政府“误判”和“天真”。代表性论述包括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研究员迪比亚什·阿南德（Dibyesh Anand）关于“欺骗性战争”的叙述，⁹以及前印度情报局（IB）局长穆利克（B.N. Mullik）在回忆录中将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直接定义为“中国背叛”。¹⁰

进入当代后，这一叙事结构被直接套用于2020年边境冲突。印方官方、主流媒体及部分学者持续宣称中方“破坏边境现状”“推进军事化”，并将实控线附近中方正常巡逻、补建基础设施等活动污称为“改变现状”。与此同时，印方对自身越界挑衅行为刻意淡化甚至回避，包括2001年在东段越界侵占东章瀑布、2017年在亚东方向越线对峙、2020年前在西段持续推进战备道路和军事部署等行为均不被纳入其叙事链条。在冲突后舆论宣传战中，印方对其媒体统一口径，对外宣传“中方挑衅”“中国违约”等定性判断，并竭力借助英文媒体传播优势塑造国际认知。在后续脱离接触谈判阶段，印媒进一步批评中方“拖延”“拒绝撤军”，回避印方将边境问题与两国经贸关系、在印中国企业经营、对华签证限制等领域捆绑施压的事实。总体看，“中国背叛”论的功能在于建构责任转嫁—受害叙事—合法自卫的逻辑链条，为印在边境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拒绝双边机制化谈判、绑定其他议题

9 Dibyesh Anand, "Remembering 1962 Sino-Indian Border War Politics of Memory,"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6, Issue.4, 2012, pp229-234.

10 B.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71, pp. 148-151.

制造话语条件，并提供舆论基础。

（五）印度“胜利”论

印度“胜利”论主要用于在边境冲突后在对内宣传上塑造强硬姿态和在对外宣传上扩大政治效果，通过夸大印方军事表现，弱化甚至掩盖实际损失，以维持舆论动员和政治合法性。在 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该叙事迅速成为印政府和媒体宣传重点。尽管印军确认 20 人阵亡，印媒仍大量宣称“中国军队伤亡人数数倍于印军”，并在社交平台集中传播类似内容，借此制造心理优势，淡化军事行动失败造成的内部压力。进入 2025 年后，印方继续使用类似操作。例如，在特朗普关税压力导致国内舆情不利后，多家印媒刻意重新发布 2022 年东章瀑布中印冲突的剪辑视频，并将其包装为“印度成功反制中国”的象征，以对冲现实政策困境带来的负面舆论。这类叙事具有明显策略性，既用于巩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用于对外展示所谓印方定力与实力。总之，印方一贯的做法是，回避战果评估、伤亡数据和军事行动背景等关键事实，不谈事件起因、控制线变化或军事态势变化，而是以夸张宣传、重复性叙述和片段材料制造既成印象，为后续政策操作、对华强硬立场和外交施压提供舆论铺垫。

（六）小结

综上所述，印度围绕边境问题的涉华舆论宣传战，甚至不惜构建虚假叙事，已经发展为带有政策目的的叙事体系。这一体系与印国内政治生态、对外战略方向以及对华政策选择互相嵌入。其运作模式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议题结构化，通过历史地图、殖民档案、战例叙述、媒体包装等方式形成完整逻辑链条，为印边境立场提供“形式合法性”；二是传播成体系化，在政府表态、外交话语、军方发声、

智库论证和媒体扩声之间形成相互支撑，使其涉华舆论宣传战叙事能够在国内外舆论空间长期保持存在；三是目的功能化，即在外交、谈判和政策博弈中将舆论叙事作为施压工具，服务边境现实利益争取，而不以事实真伪为约束。

这一叙事体系的内核并不在于外界接受程度，而在于通过建构“印度理应得到更多”的心理基础，支撑印政府对外谈判中的策略，包括固化诉求、拖延机制化进程、模糊问题边界等，并为策略性捆绑议题预留空间。尤其在两军边境脱离接触、中印关系恢复正常、经贸往来、人员通行、投资监管等议题上，涉华舆论宣传战叙事已成为印方谈判中的“成本较低、收益可控”的政治和宣传资源。

未来，这类叙事仍将长期存在，其节奏变化主要受三类变量影响：一是印国内政治周期及民族主义动员需求；二是印战略定位变化及其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三是中印边境现地态势与军事部署平衡。整体判断，印度涉中印边界舆论体系已固化，短期内不会因事实澄清或外交沟通而自行弱化。

在这种背景下，中方需要将涉中印边界的对华舆论宣传战视为印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偶发舆情现象，在涉边谈判、涉华舆论引导、涉印政策研判和国际沟通中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同时避免将印方叙事误判为立场共识或政策现实。对印度有关叙事的结构化识别、持续监测和针对性回应，将是未来处理中印边境问题及更广范围双边关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 经济合作

总体来看,印度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舆论宣传战渗透于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等全领域,也成为印度 2010 年代以来转向倚美制华战略的重要“事实依据”。在印方叙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被描绘为“美国恩赐”,且印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倒向美国是获得这种扶持的关键。基于这种逻辑,印度又渲染“中国崩溃论”,即随着美国转向遏制中国,中国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等问题陷入“崩溃”。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被印方描述为以“债务”为手段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中国合法合理的经济影响被妖魔化。印度一些政策人士甚至提出印度应该“效仿中国”,通过站在美国一边获得美支持,并推动、怂恿美国的遏华倾向,进而充分实现自身潜力而实现印度对中国的“替代”。

（一）美国“恩赐”论

印度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常宣称,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并非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恩赐”所致。在这一叙事中,中国能够崛起主要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给予的特殊机会,例如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享受对美出口的广阔市场等。在这种叙事中,美国敞开市场、“将中国纳入 WTO”等外部环境因素,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一叙事广泛见于印度高官涉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各种言论中。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团队许多成员格外倚重这一叙事,将其作为论证印倚美制华战略的合理性根基,并以此要求美西方“重视印度”。印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其两本

书《印度之路》（The India Way）和《为什么婆罗多重要？》（Why Bharat Matters）及公开演讲中多次表达：中国的崛起并非源于自身努力，而是巧妙利用了大国博弈给予的机会。¹¹ 苏杰生宣称，中国早年善于利用美苏冷战矛盾以及此后美国的战略自满来发展实力。¹² 西方长期将“扶植”中国当作战略目标，因而西方在“夸赞中国成就和历史的同时贬低印度”。¹³ 在苏杰生的叙事中，西方有意“抬举”中国，而印则被相对边缘化。中国经济腾飞被描绘为源自西方的助力与放任，且中国借助了美国等的“善意”却没有履行相应国际义务。2025年，印商工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为美方行为开脱，将导致当前国际不公平贸易局势的矛头指向中国，称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全球贸易体系遭受冲击的起点。他批评国际社会对中国入世后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视而不见”。¹⁴

印部分学者和主流媒体同样强调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实际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印度战略分析师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认为，美国数十年的接触策略促进了中国崛起，使中国得以在美国的扶持下成长为美头号地缘对手。¹⁵ 他们认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占据约40%份额并大规模对外出口，却对进口采取限制措施，这种依赖外部市场的做法使得中国难以自我包装成国际秩序的可靠维护者。¹⁶ 他们认为，正是美西方国家数十年来对中国贸易投资的开放，造就了中国的制造和出口优势，而西方正开始反思这种一厢情愿的支持。

媒体方面，《自治报》等印媒评论强调历史上的美国对华关键“让利”。在其

11 S. Jaishankar, *Why Bharat Matters*, New Delhi: Rupa, 2024, pp. 98-99, pp. 150-151;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Uncertain World*, p.8, p.47.

1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1/03/non-allied-forever-indias-grand-strategy-according-to-subrahmanyam-jaishankar?lang=en>

13 <https://www.businesstoday.in/latest/economy/story/we-have-a-harder-job-jaishankar-says-west-built-up-china-while-running-india-down-at-bt-mindrush-469010-2025-03-23>

14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goyal-chinas-unfair-practices-to-blame-for-tariffs/articleshow/120079503.cms#:~:text=others%20having%20declined%20as%20much,as%20did%20most%20other%20well>

15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policy-trade-war-competition-by-brahma-chellaney-2018-10?barrier=accesspaylog?appsule=38#:~:text=WASHINGTON%20%E2%80%93%20A%20long,as%20-America%E2%80%99s%20main%20geopolitical%20rival>

16 <https://www.ips-journal.eu/interviews/at-best-the-rules-based-order-is-an-aspiration-8577/#:~:text=But%20its%20own%20approach%20raises,basis%20for%20a%20new%20system>

评论中，如冷战高峰时期，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对中国“人权问题”则视而不见；1971年又推动让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地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并享有否决权。又如，中国在1980年代以“市场换技术”，在几乎不对等的条件下进入全球市场，却“未履行开放承诺”。¹⁷

通过“美国恩赐论”，印官员和专家学者意在淡化中国经济成就的自主性，暗示中国的繁荣离不开西方的成全，从而在话语上贬低中国模式的内生动力。这种叙事意在削弱“中国模式”影响力，贬低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其认为，中国并非凭借制度优势等内生因素脱颖而出，而是搭上了美国扶持的便车，因此中国增长若失去外部支持也难以继。与此同时，美国出于扶持中国的目的，长期对印“系统性低估”，导致印度长期在亚洲遭到打压。这一叙事进而对印转向倚美制华路线提供基础：既然中国当年能通过利用大国矛盾崛起，印也应善于“利用外部环境为己谋利”。

（二）中国经济“崩溃”论以及印度“替代”论

基于“美国恩赐论”，印在舆论宣传中进一步论证“中国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替代”。印部分政界和媒体人士热衷于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失衡，甚至面临崩溃风险。同时他们鼓吹所谓“印度替代”，宣称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和“中国+1”战略背景下，印将成为取代中国的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新增长引擎。

近年来，印舆论界大量报道和评论大肆渲染中国经济遇到的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危机、监管打击科技企业等问题，强调这些因素将导致“中国崩溃”。有印度著名学者发文宣称，受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正在失速。此前盛行的“中国将超越美国、称霸亚洲”的乐观叙事正受到上述现实碰撞，西方

¹⁷ <https://swarajyamag.com/world/the-world-has-created-a-monster-in-china-time-to-withdraw-the-free-pass#:~:text=In%20the%201980s%2C%20when%20China,still%20hasn%E2%80%99t%20done%20so%20convincingly>

整体实力依然更胜一筹，中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经济。¹⁸ 此外，一些印度学者或印裔学者也提出，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再难回到以往高位。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结束，潜在危机四伏，为“印度崛起”提供了机会窗口。¹⁹

在媒体方面，《印度快报》等主流媒体宣称，中国过去几十年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拉动经济，但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房地产行业低迷重创消费者信心，消费不足直接导致了工业产能过剩，并且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业部门承受的系统性压力，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战使这种局面雪上加霜。评论声称，中国正面临债务高企、人口下降、制造成本上升、外需减弱的多重夹击，经济增长动力显著放缓，而若中美贸易紧张长期持续，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使中国经济失速甚至停滞。²⁰

在刻意渲染中国前景黯淡叙事的同时，印度官方和媒体大力鼓吹印度将搭上全球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东风，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所谓“印度替代论”。例如，《今日印度》等媒体报道称苹果公司计划在 2025 年前将全球 18% 以上的 iPhone 产量转移至印度（而 2023 年这一比例仅 7%），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意在通过强调苹果大幅提升在印度本地生产的计划，彰显印度在电子制造领域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²¹ 再如，印媒同样将富士康等代工巨头多元化供应链、扩大在印布局的趋势，解读为“印度制造迎来机遇，可趁势承接中国的产能转移”。这些论断往往选择性忽视了印度制造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的中间品和机器设备的事实。

此外，印战略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均着重强调在中国实力衰退、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印度的战略机遇，提出世界各国正重新评估对华经济依赖，加速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而印度被视为潜在的替代目的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他

18 <https://archive.ph/Eo0EG>

19 <https://www.indiatoday.in/business/story/stuck-in-middle-income-trap-fareed-zakaria-explain-reason-behind-china-economic-crisis-davos-wef-2669724-2025-01-24>

20 <https://archive.ph/uG06s>

21 <https://www.indiatoday.in/technology/news/story/apple-bets-big-on-india-plans-to-shift-18-per-cent-of-global-iphone-production-to-india-2392976-2023-06-14>

们认为新冠疫情强化了“各国必须将关键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共识，而这一趋势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吸引产业和投资。²²

围绕中国经济前景与中印经济增速此消彼长，印度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对内，通过强调中国发展靠外因和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来强化印度当下对外经济政策转向的正当性和发展信；对外，通过渲染中国风险和印度机遇的差异化图景，向投资者传递“印度是更明智选择”的信息。这一系列论述既是印对于中国崛起的主观解读，也服务于印度自身崛起叙事的需要。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客观或正确，它们确已成为印政商界讨论中国话题时的主流声音，将在中长期内持续影响涉中印经贸关系的舆论场。

（三）“债务陷阱论”与“珍珠链论”

“珍珠链论”与“债务陷阱论”是印度对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另一常见宣传叙事。两种叙事紧密相连，共同用于妖魔化中国在地区国家的合法合理经济影响，服务于印对华强硬和倚美制华的政策转向。“珍珠链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在 2004 年提出，用于描述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港口投资建设，并将其隐喻为一串沿海岸线分布的“珍珠”。²³ 在印度战略界，这一概念被迅速接受，并演变为对中国地区影响力扩张的警惕性宣传：中国正在串起环绕包围印度的“珍珠链”。“债务陷阱论”最早由印学者布拉马·切拉尼于 2017 年提出，指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过度贷款，意在使受援国背上沉重债务，从而获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乃至战略资产。²⁴ 所谓“债务陷阱”被印描绘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获得战略据点的“帝国

22 chrome-extension://bleghaaifcklgdceegngmanbnfopog/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1/03/Special-Issue-MM-compressed.pdf

23 <https://swadeshishodh.org/chinas-string-of-pearls-policy-implications-for-india/#:~:text=China%E2%80%99s%E2%80%9CString%20of%20Pearls%E2%80%9D%20strategy,for%20India%2C%20this%20growing%20Chinese>

2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text=NEW%20DELHI%E2%80%93%20If%20there,them%20vulnerable%20to%20China%E2%80%99s%20influen>

主义扩张”的主要工具。这一说法在提出后迅速传播，成为印及西方舆论质疑中国海外投资动机的高频词。

在印方虚假叙事中，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国家投资港口和基础设施（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缅甸的皎漂港等），表面上是经济合作，实际却具有军事考量，没有考虑印安全关切。印度战略分析普遍认为，这些由中国控制的海外港口赋予中国军事和经济杠杆，增加了印在海上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印度应该实施名为“钻石项链”（Necklace of Diamonds）的反制策略，在关键节点布局港口基地，以破解所谓的“中国的包围圈”。²⁵ 印度学者宣称，即便中国声称这些港口设施出于纯商业目的，但在印度人看来这无异于换一种方式实施对印度的战略遏制。²⁶ 他们认为，中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拉拢印度周边小国以抗衡印度，而这些小国出于制衡邻国印度的天然倾向，也乐于引入中国作为平衡力量。²⁷

通过“珍珠链论”，印度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安全化，描绘为针对印度的包围战略，并基于这种叙事向美日等国寻求支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如火如荼地展开，印舆论界又开始大肆渲染“债务陷阱论”。印度高层官员多次公开抨击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模式。2025年2月26日，印外长苏杰生在东京的日本—印度—非洲商业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所谓“债务陷阱”外交。他公开宣称，印度不同于某些掠夺性模式，在对外投资中强调能力建设和技能转移。其言下之意十分明显，即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往往附带隐性条件并造成“债务负担”，而印度则提供无需受制于人的发展合作。²⁸ 同样地，其他印政府官员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印度对外援助项目不会像“中国贷款”那样令受援国掉入债务

25 <https://swadeshishodh.org/chinas-string-of-pearls-policy-implications-for-india/#:~:text=China%E2%80%99s%E2%80%9CString%20of%20Pearls%E2%80%9D%20strategy,for%20India%2C%20this%20growing%20Chinese>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1/03/the-road-from-galwan-the-future-of-india-china-relations?lang=en>

27 <https://archive.ph/GF5XP>

28 <https://www.firstpost.com/world/unlike-extractive-models-jaishankar-takes-a-dig-at-china-debt-trap-policy-at-japan-india-africa-forum-13866884.html#:~:text=%E2%80%9CUnlike%20extractive%20models%20of%20engagement%2C,sustaining%20growth%20ecosystems%2C%E2%80%9D%20he%20added>

陷阱，而是着力于“授人以渔”，促进受援国的自主发展。

印方学者 2021 年 4 月发文称，有研究报告揭示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合同中包含高度不对称的条款，例如严格保密、禁止借款国泄露协议、限制借款国政策主权等。他们宣称，在“债务陷阱”模式下，中国利用贷款让小国背上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一旦对方无力偿还，中国便趁机要求获取战略资产。这种做法显著提升中国对脆弱国家的杠杆影响力。²⁹ 他们多次诬称南亚和非洲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困境，认为马尔代夫在亚明政府时期亲近中国，大举借债，导致债台高筑，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上台后不得不急切寻求削减对华债务、恢复“印度优先”政策。³⁰

在印度政界和媒体眼中，“中国债务陷阱”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印媒广泛报道斯里兰卡将港口租借给中企 99 年的案例，并渲染这是中国通过债务实现“战略扩张”的铁证。虽然关于汉班托塔港债务成因的研究存在不同观点，但印度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接受“债务陷阱论”，并将其上升为对“一带一路”倡议整体的警惕。例如，《今日印度》等印媒评论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饱受批评，因其往往让合作国背上不可持续的债务，而印总理莫迪在 2025 年 7 月出访非洲和拉美时明确表示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于中国模式的选择。报道强调，莫迪此行旨在“为全球南方提供中国债务高企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³¹

印度在对外宣传中将中国描绘成以债务为工具谋求影响力的不可信方，而印度则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种叙事既服务于印度自身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塑造，也企图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削弱“一带一路”的道义基础。

29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a-damning-revelation-of-how-beijing-weaponizes-aid#:~:text=development%20aid%20and%20debt,in%20its%20dealings%20with%20vulnerable>

30 <https://archive.ph/GF5XP#selection-1325.286-1325.307>

31 <https://www.indiatoday.in/world/story/modis-five-nation-tour-breaking-chinas-debt-trap-grip-glb-2753359-2025-07-09>

（四）小结

综上所述，印度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舆论宣传战已经成为其当前倚美制华路线的“事实基础”，得到其政界、学界和媒体等全领域背书。印度当前的倚美制华政策路线就建立在印涉华经济有关叙事的基础上，莫迪及其执政团队需要涉华经济叙事压制国内反对者，并且说服国际投资者加码投注印度。具体来看，莫迪执政团队，特别是苏杰生领导的外交部和戈亚尔领导的商工部成为对华经济叙事的主要推手。苏杰生在《为什么婆罗多重要？》中用大量篇幅抨击了印国内主张对华发展经济关系的声​​音。³² 各种亲政府智库如观察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及其学者如喀什·潘特、拉贾·莫汉等，都成为了印度涉华舆论宣传的造势者。他们在印内部的主要辩论对手是经济界比较务实、主张对华合作的力量。在印度经济增长下行势头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2025 年 4 月，印度财政部在《2023—2024 财年经济调查》报告中提出应放开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的限制。印度工商业团体也持续对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宽对华限制。³³ 但这种声音刚一出现，印商工部长戈亚尔马上公开表示不欢迎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³⁴ 并且推动印度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华贸易监管。³⁵ 由此可见，印度国内一些政界和战略界人士已经成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舆论宣传战和虚假叙事的主要推手，因为这种叙事已与其政治利益高度绑定。

32 S. Jaishankar, Why Bharat Matters, pp. 144-147.

33 “Economic Survey 2023-24,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n Ministry of Finance, June 2024, pp. 143-145, <https://www.indiabudget.gov.in/economicsurvey/doc/echapter.pdf>; “India Wants to Give Chinese Visas Quickly to Help Its Own Business”, The Economic Times, July 17, 202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company/corporate-trends/india-wants-to-give-chinese-visas-quickly-to-help-its-own-business/articleshow/111798039.cms?from=mdr>.

3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economy/news/govt-not-encouraging-chinese-fdi-piyush-goyal-clears-policy-stance-125041101204_1.html

35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asia/india-trade-deficit-with-china-widens-record-992-bln-amid-dumping-concerns-2025-04-16/>.

第三章

关于跨境水资源

在中印关系的诸多敏感议题中，跨境水资源问题长期处于相对非显要位置，但却存在较强的地缘争端隐患。尤其是围绕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河流之一——雅鲁藏布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印两国既存在一定的合作基础，同时也面临着竞争与误解的风险。印度国内围绕我国在西藏境内修建水电站、调配水资源的报道与评论，往往带有浓厚的舆论宣传战色彩，甚至有虚假叙事掺杂其间。印度媒体与部分智库长期渲染“中国将水资源武器化”³⁶的论调，使得跨境水资源议题从单纯的生态与技术问题，演变为印度对华进行舆论宣传战的重要舆论工具。

（一）印度涉华水资源叙事的阶段性演进

回顾过去二十余年，印度关于中国跨境水资源开发的舆论宣传战构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 2000 年代初到 2010 年前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建设水电站的恐慌。随着中国公开在西藏自治区的一系列水电项目规划，如藏木水电站，印度媒体开始密集报道，散布“掐水恐慌”，即声称中国通过蓄水可以切断雅鲁藏布江下游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流，导致印度东北地区陷入干旱。尽管这一说法并无相关水文数据支持，印度官

36 Brahma Chellaney, “PRC Weaponizes Water,” <https://ipdefenseforum.com/2024/03/prc-weaponizes-water>

方也曾试图淡化舆情（明确表示中国建设的为径流式水电站，不涉及蓄水），但媒体的不断炒作和不实报道仍旧引发了印度民众的广泛担忧。³⁷ 在舆论的“施压”下，印度开启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大规模筑坝项目，主张其所谓的“下游权利”。

- **第二阶段出现在 2010 年至 2017 年之间，叙事从单纯的“水量担忧”升级为造谣中国将水资源“武器化”，并逐渐将该议题塑造为舆论工具。**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达孜、加查等水电站建设进程，印度媒体和智库开始将水资源议题与两国的地缘战略竞争直接挂钩，提出所谓“水资源武器化”（water weaponization）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印国内出现了大量“水炸弹”（water bomb）的虚假叙事，声称中国一旦在上游集水，就可以在战争中释放洪水淹没印度东北地区。这一叙事在 2017 年洞朗对峙期间达到高潮，印媒普遍把水资源问题与边境军事摩擦捆绑在一起，制造出一种中国可以通过“水武器”威胁印度安全的恐慌氛围。³⁸
- **第三阶段为 2018 年至今，通过将议题扩展到生态、环境、气候领域，印媒与西方媒体的叙事互相配合，形成对华战略化、多维度的负面叙事框架。**2018 年至 2020 年，印度东北多地发生洪灾。尽管造成洪灾的主要原因是强降雨和本地水利治理不足，印度舆论却将矛头指向中国，声称洪水是中国“突然泄洪”所致。³⁹ 2020 年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爆发后，中国雅下水电站项目的正常推进，再次成为印媒和部

37 The Indian Express, “India downplays China’s dam construction on Brahmaputra,”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latest-news/india-downplays-chinas-dam-construction-on-brahmaputra/>

38 Hindustan Times, “By denying river water data to us, Beijing is using the resource as a tool of coercive diplomacy,”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by-denying-river-water-data-to-us-beijing-is-using-the-resource-as-a-tool-of-coercive-diplomacy/story-4MuPdJ2SPsivMlvKzX7ktJ.htm>

39 India Today, “Flood situation worsens in Northeast as China releases water into Siang river,”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flood-situation-worsens-in-northeast-as-china-releases-water-into-siang-river-1330112-2018-09-02>

分战略界人士操纵舆论、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触发印国内民众恐慌。⁴⁰此后，相关舆论宣传战扩展到环境与气候议题。中国建设水电站以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却被印度媒体描述为“牺牲下游生态、破坏环境”的行为。这种叙事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相互呼应，使得涉华水资源虚假叙事在印度逐渐呈现出工具化、战略化与多元化的特征。

（二）主要手段与潜在逻辑

印度关于中国跨境水资源的舆论宣传战，并不是孤立的散布“错误消息”，而是形成了一套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传播策略，具体表现为制造负面标签、选择性报道、技术问题政治化等环环相扣的舆论手段。

首先，利用高度符号化的语言，将原本涉及工程、水文、气候的复杂议题，贴上简单的敌意标签。例如 2009 年，《印度时报》在报道中称“雅鲁藏布被‘阻断’后，印度东北出现洪水‘恐惧’”，⁴¹这种标签化的语言，把上游工程建设与下游灾害风险直接挂钩，将复杂的水文工程简化为“上游动作 = 下游受害”的恐惧符号。与之类似的“水炸弹”“水武器”等表述，本身也并不具备科学含义，却可以把技术工程转化为直观的威胁图景。这种“标签化”的手段能有效降低大众理解门槛，使相关虚假叙事能够迅速被公众接受并传播。

其次，传播往往依赖媒体的操作技巧，制造舆论高潮。其中选择性报道是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即在同一时间段内，来自官方的澄清以及技术专家对“径流式水电站不影响下游”的解释，常被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控制曝光量、有意埋没，

40 Roshani Jainm, “The Yarlung Zangbo Hydroelectric Project: Power at a Pric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5 Sep.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yarlung-zangbo-hydroelectric-project-power-at-a-price>

41 Times of India, “Flood fears in North-East after Tsangpo blockade,”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guwahati/flood-fears-in-north-east-after-tsangpo-blockade/articleshow/4464878.cms>

而带有恐慌情绪的标题与报道却被反复转载引用。再如视觉化操作，自 2016 年前后起，印度主流媒体在涉华水资源报道中常以卫星图、航拍工地照、示意图等作为视觉重点。图像的宏大尺度配以夸张标题，将技术工程恶意描摹为规模不可测、路径不透明、风险不可控的威胁图景。例如 2017 年，《今日印度》报道造谣“中国恶意将雅鲁藏布江引入沙漠”，⁴² 文中多次给出卫星截图并刻意标注误导性箭头，并引用退役军官解读，强化“中国完全截断水资源”的视觉暗示。

最后，印度涉华水资源舆论宣传战并不止于媒体层面，而外溢到印度国内政治与外交战略领域。部分印度智库与政客利用媒体营造的筑坝恐慌，将技术问题政治化为真实的政策议题，例如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ORF）在 2025 年发布了多份报告，一方面强调中国的雅下开发计划“不仅是能源工程，更是战略举措，将加剧印度的生态脆弱性”，把水资源议题强行拉入安全与战略维度，使原本技术性的水利工程问题高度政治化；⁴³ 另一方面，过分夸大中印水文数据共享等已有技术合作的政治意义，认为双方缺乏数据透明会“导致中印之间的外交障碍”等。⁴⁴

（三）涉华水资源叙事的现实目的与政策影响

印度涉华水资源叙事并非只影响公众舆论，而是在政治和战略层面承担着多重功能。

首先，服务于印度国内政治动员的目标。在洪水频发的印度东北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而公众对灾害归责的压力迫使其寻找“外部敌人”。2025 年 7 月，印度伪“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玛康卓（Pema Khandu）接受印度报业托斯

42 India Today, “Satellite images prove China's malafide intentions of diverting Brahmaputra water into desert,”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satellite-images-prove-china-malafide-intentions-of-diverting-brahmaputra-water-into-desert-1106739-2017-12-13>

43 Roshani Jainm, “The Yarlung Zangbo Hydroelectric Project: Power at a Pric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5 Sep.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yarlung-zangbo-hydroelectric-project-power-at-a-price>

44 Nilanjan Ghosh, Sayanangshu Modak, “How data deficiency is hindering hydro-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18 Feb.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how-data-deficiency-is-hindering-hydro-diplomacy-between-china-and-india>

拉 (PTI) 专访时,称中国筑坝工程是“倒计时中的‘水炸弹’”,构成“生存性威胁”,并声称“如果中国放水,下游肯定会发生洪灾”。⁴⁵这种表述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热议话题,转移了公众对本地防洪基础设施薄弱的不满情绪。通过这样的叙事,印度政客不仅规避了问责压力,还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凝聚政治资本。

其次,印媒涉华水资源叙事成为对华外交的“议价”筹码。在中印双边谈判中,印方屡次要求中国扩大洪水季节的水文资料共享范围。每当印度媒体炒作“中国掐水”,印在谈判中就更容易以“舆论压力”为由提出额外要求。例如,印国会议员塔皮尔高 (Tapir Gao) 在公开讲话中引用媒体对中国大坝的不实报道,指责水电工程会“阻断来自西藏的水流,给下游带来山洪暴发或水资源短缺的风险……直接影响印度的农业和供水”,并表示“印度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以使该问题得到解决”。⁴⁶这意味着印媒的涉华水资源舆论宣传战与虚假叙事被有意转化为印度外交团队的谈判诉求。

最后,相关叙事通过长期塑造,逐渐固化成为一种战略认知。在印度的安全战略界与主流媒体语境中,中国已经被描绘成“全方位威胁”,而水资源议题则成为这一威胁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智库如辨喜基金会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在 2024 年的报告中直接称中国的水电站开发项目意在“加强其在中印有争议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建议印度“加速东北水坝建设对冲”。⁴⁷这种叙事逐步进入政策建议层面,使得政府在制定战略时更容易默认中国在水资源上怀有敌意,形成自我强化的“威胁认知循环”。这种表述不仅塑造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也为印度与美国等其他外部势力的潜在合作提供了舆论正当性。

45 Press Trust of India, “China’s Mega Dam Near Arunachal Will Be Ticking Water Bomb: Chief Minister”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chinas-mega-dam-yarlung-tsangpo-dam-near-arunachal-pradesh-will-be-ticking-water-bomb-chief-minister-pema-khandu-8848839>

46 Press Trust of India, “‘Water Bomb Against India’: BJP MP On China Building World’s Largest Dam,”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water-bomb-against-india-bjp-mp-on-china-building-worlds-largest-dam-8118253>

47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dia’s Energy Transition in a Carbon-Constrained World,” <https://www.vif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India-s-Energy-Transition-in-a-Carbon-Constrained-World-Final-Report.pdf>, pp.138-139.

（四）小结

印度关于中国跨境水资源的舆论宣传战，历经二十余年不断演变，其特点呈现出阶段性、工具化与战略化趋势。从最初的“上游建设引发下游恐慌”，到中期将水资源问题与地缘竞争挂钩，再到近期扩展到生态、环境与气候领域，印度媒体与智库通过持续渲染与选择性报道，将原本技术性和生态性的议题政治化和安全化。

除了在叙事内容上的主观建构，其手段也日趋综合，不仅利用传统符号化与标签化的做法，将复杂的水文、工程问题简化为“威胁图景”，刺激民众的情绪化反应，还通过制造舆论高潮，利用视觉化操作和信息筛选强化恐慌感。近年来，印方更是进一步将水资源问题与政治政策工具相捆绑，将媒体舆论转化为外交谈判和战略布局的筹码。

从影响来看，涉华水资源虚假叙事成功助力印度地方政府转移治理压力、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在外交层面更是成为印度与中国谈判的舆论支撑。**在战略层面**，它强化了水源地民众对中国威胁的负面认知，为印方在印太格局下与域外势力合作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

总体来看，印度涉华水资源舆论宣传战与虚假叙事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夸大风险、政治化议题和战略化传播，实现对公众、政策及外交多维度的控制与影响。这种叙事已超越水利与生态本身，成为印方在中印关系和区域安全竞争中长期运用的舆论与战略工具。

第四章

关于涉藏问题

我国西藏自治区是连接东亚、中亚、南亚与西亚的重要地理枢纽，屹立于西藏最南缘的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西藏所处的青藏高原不但是我国和亚洲多条著名河流的发源地，还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资源禀赋使印度长期觊觎西藏，认为一个“独立”的西藏对印度安全至关重要，⁴⁸ 并基于此持续对华进行舆论宣传战、编造了许多关于涉藏问题的虚假叙事。

（一）谬称西藏为“独立国家”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并在此之后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但是，印度政界、学界和媒体却否认这一历史事实，⁴⁹ 经常声称印度的邻国是西藏、而非中国，⁵⁰ 长期散布并呼吁其他国家接受“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谬论。⁵¹ 此外，印度还鼓吹西藏应该包括西藏自治区和中国政府指定为藏族自治的地区两部分，后者包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自治县，青海省果

48 Dev Raj, “15,000 km Motorcycle Rally for Free Tibet: 15 Youths Call to End Cultural Genocide by China,” The Telegraph,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india/15000-km-motorcycle-rally-for-free-tibet-tibetan-youth-congress-call-to-end-genocide-by-china/cid/2070945#goog_rewarded; Anil Kumar Lal,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 Sovereign State (Not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hy US and UN Need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Based on Cold Historical Facts (Part 2),”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akshakindia/tibet-is-an-independent-sovereign-state-not-an-autonomous-region-of-china-why-us-and-un-need-to-change-their-perception-based-on-cold-historical-facts-2/>.

49 “Tibetans Appreciate US Senate for Pushing China-Tibet Negotiations”, Indo-Asian News Service, April 17, 2024, <https://ians.in/english-wire-detail/tibetans-appreciates-us-senate-for-pushing-china-tibet-negotiations--20240417175105>.

50 “Spoof of the World: Rhetoric Turned on Imperialist Beijing”, The Telegraph, July 10, 2025,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india/aranachal-pradesh-shares-a-border-with-tibet-not-china-cm-khandu-offers-a-correction-prnt/cid/2112293>.

51 Rezaul H. Laskar, “Countries Should Accept Tibet’s Historic Status as Independent Nation: Penpa Tsering”, Hindustan Times, September 3, 2024,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countries-should-accept-tibet-s-historic-status-as-independent-nation-penpa-tsering-101725352851785.html>.

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⁵²

第一，印度学者无视历史，缪称西藏在 14 世纪中叶后的 400 年时间里都是完全独立的。⁵³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主权管理是以元朝为起点的。1247 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1271 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368 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对西藏的主权。明朝中央对元代西藏地区的官职名称、品秩基本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⁵⁴

第二，印方将清政府对西藏所行使的统治权谬称为“宗主权”。在印度叙事中，使西藏地位发生改变的事件是 1720 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击败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但他们依旧不认为这一事件使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是将清政府对西藏所行使的统治权谬称为“宗主权”。⁵⁵ 印度媒体所依据的最直接的资料是《英国和俄罗斯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lating to Persia, Afghanistan and Tibet），英俄两国在条约中

52 Bhaswar Kumar, "What Is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 Passed by US Congress Last Week?", Business Standard, June 19, 202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external-affairs-defence-security/news/china-may-face-major-us-challenge-to-its-control-of-tibet-soon-here-s-how-124061301077_1.html.

53 Anil Kumar Lal,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 Sovereign State (Not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hy US and UN Need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Based on Cold Historical Facts (Part 1),"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akshakindia/tibet-is-an-independent-sovereign-state-not-an-autonomous-region-of-china-why-us-and-un-need-to-change-their-perception-based-on-cold-historical-facts/>.

54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中国人大网，2009-03-17，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xzdbtcfmj/2009-03/17/content_1493684.html.

55 Anil Kumar Lal,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 Sovereign State (Not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hy US and UN Need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Based on Cold Historical Facts (Part 1),"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akshakindia/tibet-is-an-independent-sovereign-state-not-an-autonomous-region-of-china-why-us-and-un-need-to-change-their-perception-based-on-cold-historical-facts/>; Vivek Gumaste, "India Must Change Its Policy on Tibet," The Sunday Guardian, April 22, 2023, <https://latest.sundayguardianlive.com/opinion/india-must-change-its-policy-on-tibet>.

承诺“尊重西藏领土完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基于此承诺“在没有中国政府作为中间人的情况下不与西藏进行谈判”。据此，印度媒体将中国政府在签署1906年《中英续订印藏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中的角色评价为“作为英国和西藏‘中间人’的宗主国”。⁵⁶在印度的叙事中，清王朝覆灭后，西藏和中国之间“附庸国—宗主国”的关系也随之结束，西藏自此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⁵⁷

第三，关于中华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印度叙事妄称西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已呈现出“国家”特征。法律上，被印度学者用于证明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标志性事件是1913年《蒙古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友好与联盟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nd Tibet）的签署。⁵⁸而事实上，中华民国政府1946年1月才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外，印度方面援引的事实方面的所谓依据是，达赖喇嘛于1913年宣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小国”，中国政府在1949年前既未对此表示抗议，也从未对西藏进行过实际控制。⁵⁹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宣告所谓“独立”是英属印度1913年对中国非法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其出发点就是违反国际法的，根植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将西藏规定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签字，所谓中方没有异议是彻底的谬论。

第四，印度方面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歪曲为“中国入侵西藏”。正式宣布西

56 Anil Kumar Lal,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 Sovereign State (Not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hy US and UN Need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Based on Cold Historical Facts (Part 1),"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akshakindia/tibet-is-an-independent-sovereign-state-not-an-autonomous-region-of-china-why-us-and-un-need-to-change-their-perception-based-on-cold-historical-facts/>.

57 Vivek Gumaste, "India Must Change Its Policy on Tibet," The Sunday Guardian, April 22, 2023, <https://latest.sundayguardianlive.com/opinion/india-must-change-its-policy-on-tibet>.

58 Phurba Thinley, "Tibet-Mongolia Treaty of 1913, a Proof of Tibet's Independence: Interview," Phayul, November 12, 2008, <https://www.phayul.com/2008/11/12/23205/>.

59 Anil Kumar Lal,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 Sovereign State (Not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hy US and UN Need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Based on Cold Historical Facts (Part 2),"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akshakindia/tibet-is-an-independent-sovereign-state-not-an-autonomous-region-of-china-why-us-and-un-need-to-change-their-perception-based-on-cold-historical-facts-2/>.

藏和平解放的法律文件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第1条明确宣告：“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但是，为否认这一协议的法律效力，印度方面捏造出了所谓“《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暴力胁迫下签署的”之类的细节；更荒谬的是，印度媒体毫无依据地揣测盖于协议上的西藏印章是中国政府伪造的。⁶⁰

（二）推动将涉藏问题国际化

为避免被指责干涉中国内政，印度方面故意借用有关民族自决权和人权的国际法规则，将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涉藏问题包装为涉及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事项，进而论证其一系列煽动西藏“独立”的言论。事实上，印度的真实用意并非关心西藏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权利，而是旨在通过煽动西藏“独立”来削弱中国对印度的所谓“地缘政治威胁”，进而巩固并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⁶¹

一方面，印度方面以人权为工具，发布了各类诬称中国政府“侵犯海内外藏人基本权利”的报告和新闻报道。此类舆论宣传战和虚假叙事存在三方面特点：其一，诬称中国政府侵犯藏人人权行动的规模已从“内部镇压”扩大到了“跨国镇压”。⁶²其二，捏造所谓“文化灭绝种族”（cultural genocide）。相关报道捏造了一系列抹黑中国政府的案例，如强制将西藏儿童送往寄宿学校学习汉族的语言和文化，⁶³

60 Vivek Gumaste, “India Must Change Its Policy on Tibet,” The Sunday Guardian, April 22, 2023, <https://latest.sundayguardianlive.com/opinion/india-must-change-its-policy-on-tibet>.

61 Srijan Sharma, “China’s Tibet Agenda Puts India on Edge”, The Probe, July 9, 2025, <https://theprobe.in/world/chinas-tibet-agenda-puts-india-on-edge-9477036>.

62 “Chines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Tibetan Diaspora Communities 2024,”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ebruary 6, 2024, pp. 9-21, <https://tchrd.org/2024/02/06/report-reveals-chinese-transnational-repression-spreading-fear-and-disempowering-exiled-tibetans/>.

63 Naresh K Thakur, “China Forcing Cultural Unity Through ‘Sinicisation’ of Tibet: Sikyong on 64th Tibetan Uprising Day,” Hindustan Times, March 11, 2023,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cities/chandigarh-news/china-forcing-cultural-unity-through-sinicisation-of-tibet-sikyong-on-64th-tibetan-uprising-day-101678490161294.html>; Priyanjali Narayan, “China’s Xi Makes Rare Visit to Tibet, Says Tibetan Buddhism Needs to Change,” India Today, August 21, 2025, <https://www.indiatoday.in/world/story/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rare-visit-tibet-talks-buddhism-dalai-lama-china-autonomous-region-60-anniversary-2774622-2025-08-21>.

诬称这些“同化”措施使语言等藏族文化元素濒临灭绝。⁶⁴其三，此类报道经常使用“受害者自述”的叙事手段，以迷惑读者相信其“真实性”。例如，印度境内的伪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近年发布的多份报告，不但编造了所谓中国政府“迫害”藏人的故事，还配上了大量所谓“受害者”的自述和照片。⁶⁵采取这一叙事手段的目的是通过所谓“真人真事”与图片的双重冲击使读者产生共情与同情，进而为其捏造的故事增加可信度。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鼓吹西藏人民享有民族自决权，声称中国和西藏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国际争端，主张应根据国际法解决。⁶⁶印度方面支持加拿大和美国通过的有关中国西藏的动议和法案，支持西方政客的说辞。印度媒体对这些披着“法律”外衣的分裂性言论大肆报道，在印度国内营造出了“西藏人民的人权受到压迫”的舆论氛围。

印度方面企图将涉藏问题国际化的这番操作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有关国际法规则。第一，印度方面所谓中国政府侵犯藏人人权、消除藏族文化元素的宣传不符合事实。中国政府在《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的白皮书中已对印度的多项虚假指控作出回应。在推进西藏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政府“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以安全守护人权”“坚持依法保障人权”。针对西藏儿童被强制送往寄宿学校的虚假报道，白皮书指出：“学校寄宿服务有效

64 Naresh K Thakur, “China Forcing Cultural Unity Through ‘Sinicisation’ of Tibet: Sikyong on 64th Tibetan Uprising Day,” Hindustan Times, March 11, 2023,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cities/chandigarh-news/china-forcing-cultural-unity-through-sinicisation-of-tibet-sikyong-on-64th-tibetan-uprising-day-101678490161294.html>; Priyanjali Narayan, “China’s Xi Makes Rare Visit to Tibet, Says Tibetan Buddhism Needs to Change,” India Today, August 21, 2025, <https://www.indiatoday.in/world/story/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rare-visit-tibet-talks-buddhism-dalai-lama-china-autonomous-region-60-anniversary-2774622-2025-08-21>; Gerald Roche, “Tibet Is One of the Most Linguistically Diverse Places in the World. This Is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26, 202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ibet-is-one-of-the-most-linguistically-diverse-places-in-the-world-this-is-in-danger-of-extinction-246316#:~:text=Tibet%20is%20a%20linguistically%20diverse%20place.%20In%20addition,Tibetans%20%28around%20250%2C000%20people%29%20speak%20a%20minority%20language>.

65 “Chines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Tibetan Diaspora Communities 2024,”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ebruary 6, 2024, pp. 9-21, <https://tchrd.org/2024/02/06/report-reveals-chinese-transnational-repression-spreading-fear-and-disempowering-exiled-tibetans/>; “Dissenting Voices: The State of Expression in Tibet,”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ebruary 6, 2025, <https://dev.t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5/02/FOE-Report-pdf>.

66 “Sikyong Penpa Tsering Visits Kamrao Settlement, Emphasising Tibet-China Conflict Resolution,” ANI, April 22, 2025, <https://www.aninews.in/news/world/asia/sikyong-penpa-tsering-visits-kamrao-settlement-emphasising-tibet-china-conflict-resolution20250422125311/>.

解决偏远农牧区学生上学不便问题……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是否寄宿，学生周末、节假日可以回家，家长参与寄宿生活的管理和规划，最大限度保障各族学生平等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针对语言等藏族文化元素濒临灭绝的所谓指控，白皮书指出，国家自 2015 年起先后发布了《信息技术藏文词汇》和藏语新词术语，开通了汉藏对照术语查询平台，不但在教育和术语标准化规范化领域保障学习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还在出版、传媒、生活等领域广泛使用藏语言文字，在行政领域保障使用藏语言文字的权利。

第二，印度方面煽动藏人行使所谓“民族自决权”的真正意图是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自决权主要适用于殖民地和自治领土人民。目前，国际法并无一国少数人群有单方面分离的一般权利的规则；⁶⁷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在殖民地以外的情况下通常也不会明确承认由民族自决权引发的分离后果。⁶⁸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和“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政策和做法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中，中国政府均向国际法院提交书面陈述，指出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限于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这两种情形，⁶⁹“国际法下不存在所谓‘救济性分离’或‘救济性自决’的权利”。⁷⁰此外，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在“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的标题下明确表示：“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综上，西藏不属于适用民族自决权的情形，印度方面的相关评论和报道存在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险恶

67 赵建文：《人民自决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关系》，《法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黄瑶：《后冷战时期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原则》，《法学家》2006 年第 6 期。

68 Ved P. Nanda,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Validity of Claims to Secede”,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2), 1981, p.271.

69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16, 2009, pp.3-5; *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srae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25, 2023, para.37.

70 *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srae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25, 2023, para.38.

用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规则。

（三）小结

综上所述，印度方面关于涉藏问题舆论宣传战要点可概括为：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主权国家”，版图包括西藏自治区和藏族自治的地区；目前，海内外藏人的基本权利正在遭受中国政府的“压制和侵害”，他们有权行使国际法下的“民族自决权”获得“独立”。印度方面这些论调甚至是虚假叙事直接继承自英国殖民者，并将在未来持续产生负面影响。印度方面长期热衷于就涉藏问题发动舆论宣传战与编造虚假叙事的真正目的是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所谓“缓冲地带”。这些叙事混淆是非，抹黑我国国际形象，并且与美西方相关论调形成彼此支撑。

第五章

关于中国“神山圣湖”

2026年2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在新德里举行新一轮中印战略对话。有媒体报道，印方在对话中表示希望未来继续扩大朝圣规模。在2024年10月“喀山峰会”之后至今中印两国为改善关系而进行的谈判中，印度香客到我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问题成为印方优先事项。中国的“神山圣湖”为何会成为印度香客的圣地？印度政府又为何如此重视香客朝圣问题？允许和接待印度香客赴藏朝圣对我有何影响？中方必须厘清其历史源流，深入分析印方意图及其影响，慎重对待。

（一）当代印度人对我国“神山圣湖”的称呼

“神山圣湖”中的“神山”指的是冈仁波齐，冈仁波齐是世界公认的神山，有“神山之王”的美誉，被西藏原生宗教苯教、藏传佛教等视为“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的南面就是玛旁雍错，是中国湖水透明度最高、蓄水量第二大的天然淡水湖，有“圣湖”和“世界江河之母”的美誉。“神山圣湖”四周分别分布着马泉河、孔雀河、象泉河、狮泉河。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孔雀河是恒河源头之一；象泉河流入印度后叫萨特累季河，是印度河主要支流；狮泉河出境后就是著名的印度河。“世界中心”加上“百川之源”进一步增加了“神山圣湖”的神圣性。

印度人现在将冈仁波齐称作“凯拉什”（kailash），根据印度神话传说，印度教徒认为“凯拉什”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的居所，梵语意为“湿婆的天堂”。按照印度教传统，一个人一旦到“凯拉什”朝圣，他所有的罪恶都会消失，绕行108圈，就意味着直接获得涅槃（自由）。印度人将圣湖玛旁雍措称为“玛那

萨罗瓦”（Mansarovar）。根据印度神话传说，“玛那萨罗瓦”是由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创造之神梵天用意念创造的，是梵天的天堂，神灵居所。印度教徒认为绕湖、在圣湖沐浴或者喝了圣湖的水可以摆脱在世俗生活中犯下的罪孽。

（二）印度香客赴藏朝圣主要是帝国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

实际上，“神山圣湖”最早是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圣地。藏传佛教进入西藏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缓和与苯教的政治矛盾，更好迎合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同时为了附会佛教经典著作中的传说，提高自身地位，将冈仁波齐附会为“大雪山”，将玛旁雍措附会为圣湖“阿耨达池”。

而在印度教典籍中，湿婆的居所“凯拉什”山和梵天创造的“玛那萨罗瓦”圣湖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马凯（Alex McKay）的研究，历史上印度教传说的凯拉什大约有6个，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以西、帕米尔以东的广大区域内。印度学者普雷曼舒·查克拉巴蒂（Premangshu Chakrabarty）和桑乔伊·库马尔·萨杜克汗（Sanjoy Kumar Sadhukhan）也承认，耆那教徒和印度教徒声称冈仁波齐是他们传说中的须弥山的说法是近代才有的。长期以来印度教徒认为湿婆的住所在北阿肯德邦的凯达尔纳特（Kedarnath），主要去那里朝圣。⁷¹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早在公元前就有印度教徒赴藏朝圣，但“神山圣湖”周边并没有发现印度教遗迹，因此这种说法非常可疑。反倒是近几十年来，有印度教苦行僧越境沿朝圣路线在岩石上雕刻印度教标志和字母的事情发生。10—17世纪的印度教徒朝圣至今无独立史料文献核实，仅有宗教典籍中的神话记载。

在19世纪，印度教才出现把冈仁波齐认定为“凯拉什”的说法。锡克王国兴起并控制拉达克后，发动森巴战争入侵西藏，曾资助修建朝圣驿站，并派兵护送印

71 Premangshu CHAKRABARTY, Sanjoy Kumar SADHUKHAN, Destination Image for Pilgrimage and Tourism: A Study in Mount Kailash Region of Tibet, *Folia Geographica*, Volume 62, No. 2, 71–86, (2020)。

度教徒朝圣。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推动朝圣合法化以获取贸易利益。20 世纪初，印度出现了大量有关“凯拉什”的宗教、商业、学术等活动，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普通民众只知“凯拉什”，而不知冈仁波齐的现象。⁷² 印度学者普雷曼舒·查克拉巴蒂等认为，印度教徒前往冈仁波齐大规模朝圣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在英国赞助下逐渐兴起的，其目的是为了与中国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斯瓦米·普拉纳万达（Swami Pranavanda）是一位苦行僧，是有名的印度宗教组织巴拉特舍瓦桑哈（Bharat Shevasram Sangha）的创始人，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分别在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组织了 23 次和 25 次环绕活动，护送了约 5000 名朝圣者。⁷³

（三）印方企图利用香客朝圣在我国“神山圣湖”确立“文化主权”

由于“神山圣湖”在印度教徒心中的神圣地位，加上印度拥有十多亿印度教徒，因此对朝圣的需求严重过剩。作为选票政治的一部分，印度政府一直都非常重视满足信徒的朝圣需求。中印建交后，香客朝圣问题成为中印谈判焦点之一。据杨公素回忆录记载，“印度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时曾说，这是印度教的圣湖圣山，印度人曾把甘地的骨灰撒进圣湖，印度人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同时，中方可能也没有意识到，1947 年获得独立的印度深受英国殖民者地缘政治思维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企图构建一个以其为中心的曼陀罗世界体系。

中方当时接受印方请求，可能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对该问题的历史缘由，特别是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并不了解；二是希望同印度建立友好关系，**

72 Alex McKay, *Kailas Histories: Renunciate Trad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imalayan Sacred Geography*, Leiden: Brill, 2015, 见邓辉：《西藏阿里“神山圣湖”与中国古代天下之中昆仑山》，载《历史地理研究》2023, Vol.43, Issue (1): 63-77。

73 Premangshu CHAKRABARTY, Sanjoy Kumar SADHUKHAN, *Destination Image for Pilgrimage and Tourism: A Study in Mount Kailash Region of Tibet*, *Folia Geographica*, Volume 62, No. 2, 71-86, (2020)。

解决所谓印度在西藏的特殊地位问题，打破外交孤立；三是受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与印度建立长期联系图谋的蒙蔽，认为可以为汉藏佛教徒提供赴印朝圣便利，在对等基础上维护我国权益。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印度香客可到冈仁波齐与玛旁雍措朝圣，中国香客可赴印度的瓦拉纳西、鹿野苑、格雅和桑吉朝圣，双方为对方宗教信徒朝圣提供便利。⁷⁴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两国关系进入了“冰冻期”，香客朝圣全面停止。1981年6月，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印，双方同意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以改善两国关系。利用双边关系缓和的有利气氛，印方提出恢复印度香客赴藏朝圣要求。从1982年开始，中方重新恢复印度香客赴藏朝圣。印度学者认为，中方之所以同意恢复香客朝圣，是因为意识到朝圣旅游所能带来的利润，但对朝圣规模的限制则体现了中方维护基本地缘政治利益的意图。需要注意的是，自1982年，印度香客入藏朝圣基本是中方给予印方的单方优惠，而非1954年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的对等安排。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两国关系改善，印方不断向中方要求扩大香客朝圣规模。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每年印度赴藏朝圣香客达到20000左右。印方不断要求扩大朝圣香客规模，不仅是由于选票政治的原因，而且怀有更阴险的目的，企图在我国“神山圣湖”确立其“文化主权”，甚至怀有领土野心。2019年4月，印度文化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所谓位于印度境内的“冈仁波齐神山景观”（Kailash Sacred Landscape）列入世界遗产，其综合门户网站雷迪夫网甚至造谣称印度在距冈仁波齐不远的西藏阿里地区门士乡有块包括5个村庄的“飞地”，从未正式解决归属问题，印度对此仍有声索权。⁷⁵

2023年5月“大婆罗多”壁画在印度新议会大楼亮相，包括“神山圣湖”在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CHSC/19540429.T1C.html>

75 “欲将‘冈仁波齐神山景观’申遗，印度三哥这是又打算上房揭瓦了？”，2019-07-09，<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40390>

内的我国西藏赫然被囊括其中。2023 年 10 月，莫迪跑到据称是湿婆及其妻子帕尔瓦蒂前往冈仁波齐峰时曾停留的阿迪·凯拉什山（Adi Kailash）朝圣和冥想。2025 年 6 月 8 日，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英迪拉什·库马尔（Indresh Kumar）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指责国大党使印度失去了“神山圣湖”。⁷⁶“神山圣湖”已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的一部分，是莫迪政府“文化开疆”或“神话开疆”的具体体现。

（四）小结

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原本就不是印度教传说中的“凯拉什”和“玛那萨罗瓦”，印度香客赴藏朝圣主要是帝国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今天，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不是一个简单的两国民间人文交流和宗教问题，而是包含着复杂的选票政治考虑和地缘政治野心。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方对印度人民友好、照顾印民众宗教情感、增进两国人文交流的特殊安排。在筹备过程中，中方克服了许多困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况且，“神山圣湖”周围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中国承受不起大量印度人涌入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印度方面不应得寸进尺，在朝圣方面继续向中方提出无理要求，更不能利用宗教问题实现其不可言说的政治目标。

⁷⁶ “We lost Kailash Mansoravar as they lost to Chinese: RSS leader Indresh Kumar”, 2025 年 6 月 8 日, <https://x.com/NewsArenaIndia/status/1931710314669593081>

结论：歪曲对华认知不符合印度自身地位与利益

本报告从边界争端、经济话语、跨境水资源、涉藏问题以及“神山圣湖”五个领域，系统揭示了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运作方式。然而，这些表象背后所共有的深层逻辑，显示其都出于印度根植于殖民经验的历史心态，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和思潮则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个深受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国家，独立七十余年后，印度在认知和处理对华关系时，仍高度依赖英印殖民者留下的地图、条约、叙事框架乃至地缘想象，将殖民遗产内化为自身国家主张的“法理”依据。印度教民族主义则把这些遗产重新包装为文明复兴、民族尊严、宗教权利和对华示强政治。这种殖民心态与激进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叠加，构成了印度战略行为的深层根源。

第一，论据来源高度依赖殖民遗产。自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启动涉华舆论信息战之始，其涉华宣传所援引的史料、地图与法律文件，最初主要出自英印殖民当局的遗存，当然后来也有很多据此进一步编造的材料。1907 年《英俄条约》中对中国主权的刻意矮化、1914 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属印度代表私下草绘的那条未经中国政府承认的分界线、19 世纪英印军队在西藏境内的非法测绘记录，这些服务于殖民侵略的产物在独立七十余年后仍被反复援引，被包装成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依据。1954 年印度测量局在官方地图中将“麦克马洪线”从“未定边界”径自改为“已定边界”，这一操作本身既无历史依据，也无国际法认可，却至今仍是印方领土主张的核心依托。殖民者留下的档案、地图和条约，至今仍在为印度的领土主张和国际叙事提供“事实”支撑。这一依赖本身，正是印度已内化的殖民心态和殖民残余的写照。

结论：歪曲对华认知不符合印度自身地位与利益

第二，地缘政治目标延续英属印度帝国的地缘想象。英国殖民者将中国西藏视为南亚次大陆北部的战略缓冲，将争议边境视为“科学边疆”的组成部分，将印度洋沿岸港口与航道视为海权控制的支柱。在此基础上，尼赫鲁构思了他的“大印度联邦”计划。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属印度帝国的领土轮廓，也继承了相应的扩张性想象。对西藏“独立地位”的持续鼓吹、将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投资定性为“珍珠链”包围、2023年在新议会大楼壁画中将中国西藏纳入“大婆罗多”版图。这些现象的共同底色，是印度将自身定位为英属印度帝国地缘战略遗产继承者的殖民思维冲动。印方围绕上述议题的涉华舆论宣传战，甚至不惜编造虚假叙事，恰恰是服务于一套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地缘政治诉求的舆论工具。

第三，宣传方法借力于自英国殖民时期奠基的英语网络与印裔精英影响力。英国殖民体制塑造了独立后印度的知识与决策阶层，以英语教育为核心的精英培养机制赋予了这一阶层进入英美主流话语空间的结构性优势。布拉马·切拉尼“债务陷阱”概念能够在西方媒体中快速传播，印度裔精英在国际机构和西方学术媒体中的活跃，2020年加勒万冲突后英语世界媒体普遍将中国定性为挑衅方，都说明印度的涉华舆论战并非只在国内发生，而是深度嵌入英美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一舆论格局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殖民主义遗留的传播结构和全球印度裔精英网络长期铺垫的结果。

第四，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和思潮在当代对上述殖民遗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殖民主义留下的是地图、档案、边界线和帝国的地缘想象，但这些遗产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持续高强度的对华动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出于欺骗国内民众和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的需要，印度涉华舆论信息战从未停息，反而变本加厉。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印度人民党上台，使得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及虚假叙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教民族主义把殖民时期形成的边界主张、涉藏叙事和喜马拉雅地缘想象，重新包装为印度文明复兴的组成部分，把原本属于殖民扩张的历史遗产改写成印度文明空

间、宗教权利和民族尊严问题。这样一来，对华强硬就不再只是外交政策选择，而被塑造成印度重新找回历史地位和文明荣耀的必要行动。

这一点在“神山圣湖”问题上表现最为集中。现在，印度方面不断把赴藏朝圣包装为印度教徒的天然权利，并进一步赋予其文明和政治含义，这说明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工程。所谓朝圣、文化联系和文明记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文化开疆”和“神话开疆”。这种叙事会不断推高印度社会对相关问题的期待，也会迫使印度政府在对华交涉中提出更多超出现实边界的要求。

第五，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是印度处置内外矛盾，推动国家整合的深层需要。

印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捏合的多元国家，内部的语言、宗教、种姓裂隙始终存在，国家整合并不稳固。殖民思维下塑造的共同外部对立面成为维系整合的惯常机制。殖民时期留下的边疆治理方式、族群分类制度和分而治之逻辑，使印度独立后始终面对复杂的内部整合压力。印度教民族主义试图用单一文明身份捏合这些裂隙，把复杂多元的印度改造成一个以印度教多数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但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内部不平等、地区差异、边疆疏离和发展失衡，反而需要不断寻找外部对立面来维持动员。巴基斯坦，以及中国正是在这种政治需要中被塑造成便利的外部对立面。

印度政治与社会的内在分裂性，为印全社会参与涉华舆论宣传战推波助澜，为此甚至不惜构建虚假叙事。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需要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凝聚支持，把边界摩擦、水资源争端、涉藏问题和“神山圣湖”议题转化为展示强硬姿态的政治资源。反对党为避免被指责对华软弱，也往往被迫跟进类似立场。这种党派竞争使印度涉华舆论不断极端化，理性声音越来越难进入主流空间。军方需要外部威胁支撑预算扩张，情报机构需要中国威胁维持存在价值，保护主义工商业团体也可以借对华强硬建立市场壁垒。于是，涉华虚假叙事逐渐从宣传话语变成利益结构，各方都能从中获得政治、制度或经济收益。此外，一些关键决策者还对此推波助澜，印外长苏杰生就在《为什么婆罗多重要》中将中国崛起定性为“搭便车”而非自身制

结论：歪曲对华认知不符合印度自身地位与利益

度能力的体现。对一个外交部长而言，这是代价颇高的认知盲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具有长期性。它不会因为事实澄清而自然消失，也不会因为中印关系阶段性缓和而根本减弱。其背后既有殖民主义留下的历史材料、地缘想象和传播网络，也有印度教民族主义提供的当代动员机制，更有印度内部脆弱性带来的深层需求。印度需要通过外部敌人维持内部整合，需要通过对华强硬证明国家力量，需要通过抹黑中国来缓解自身发展焦虑。正因为如此，印度涉华虚假叙事已经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偶发舆情现象。

当然，不可否认，在印度政治和知识谱系中，始终存在着少数对上述叙事保持批判距离的声音。印度资深政治人士、前石油部长兼外交官马尼·香卡尔·艾亚尔（Mani Shankar Aiyar）是印度政界最持久的对华友好倡导者之一。他多次访华，公开主张中印两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文明国家应当建立战略合作而非战略竞争，并将莫迪政府的对华强硬路线批评为损害印度长远利益的短视。已故的印共（马）前总书记西塔拉姆·叶楚里（Sitaram Yechury）是印度左翼政治中坚持中印友好的代表性人物。他多次在议会和公开场合批评印度媒体对华的情绪化报道，明确反对印度向美国的对华战略靠拢，认为这将侵蚀印度历史上作为不结盟运动重要力量所积累的外交自主性。这些人的存在说明，在对华舆论塑造方面，印度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声音在莫迪执政后的舆论生态中日益边缘化，但它们揭示了印度内部仍有重建理性对华认知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发起涉华舆论宣传战，甚至是不惜构建虚假叙事，印度对华政策事实上仍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当代的遗毒。这种选择并不符合印度作为独立文明大国的历史地位，也不符合印度人民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现实利益。中印关系保持和平稳定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但两国关系要真正稳定下来，就需要印度从根本上改变其涉华舆论宣传战，杜绝捏造涉华虚假叙事，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为上都要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关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60年，是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知名智库。我院的主要任务是：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咨询为方向，通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多年来，我院一直被国内外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智库之一。

我院设有六个研究所，分别是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台港澳研究所；同时，我院设有十一个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此外，我院还设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沪港澳合作研究中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民间外交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项目制研究平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文刊物《国际展望》双月刊，《上研院报告》（中英双版）和英文刊物《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季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论坛。

主 编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执行主编

李 忻 上研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编 辑

陈 雪 上研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出 品 人

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执行出品人

毛瑞鹏 上研院智库发展与科研服务处

副处长（主持工作）

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

© 本报告版权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所有

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95 弄 15 号

邮政编码：200233

联系电话：+86-21 54614900

传 真：+86-21 64850100

<http://www.siiis.org.cn>



© 2026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15 Tianlin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00233, PRC

Tel/Fax: +86 21 64850100

www.siiis.org.cn